

从“民国铁路”的神话说起

凌河



今日论语

80年前那一段“民国铁路”，忽然引出了今天网上的疯传——说那时的火车多快呀，那时的京沪铁路，全程“仅需”8小时！这还了得，今天的京沪铁路，动车需12小时，就连高铁仍要5小时呢！于是网上网下，一片质疑。尽管早有有识之士指出，那时的“京”指的并非今日之北京，而是彼时的首都南京，“京沪”相距只有区区300公里，当然只要“8小时”啦，但是仍有人不理睬这明摆着的凿凿事实和浅显的常识。关于“民国铁路”的神话，至今也没偃息。

关于“民国”的神话，为什么如此吸引人？有人说，因为人们在

现实中有不满与困惑，所以容易投射到“想象的过去”；也有人说，因为过去历史教育的“刻板化”与“脸谱化”，所以催生逆反心理，人们容易接受一些“新鲜刺激”的说法，哪怕它多么荒诞不经。

然而有些“说法”，“刺激”是刺激矣，果真是那样“新鲜”么？比如也是“民国”，1946年12月24日，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了北大女生沈崇，导致全国爆发抗议运动。“沈崇案”过去一个甲子，今天却有人说沈崇本是共产党“派遣”，目的是激起风潮。其实“倒钩说”并非“新鲜”的“发现”，只要翻一翻1946年底的国民党小报，就知道这本是当年一个叫做“情报网”的蒋特机关杜撰的谣言，波污延安而已，连特务组织都觉得这说法“过于离奇，不易被人相

信”。可见关于“民国”的“说法”，并不都那么“新鲜”，有的甚至只是抄袭当年的谣言，叫做沉渣泛起吧！

当然也有“新鲜货”，由今人创作的——比如过去，我们有过片面偏颇，一概否定“正面战场”，现在呢？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似乎只是国民党一家在抗战，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和敌后武装抗战的业绩，又一字不提了，更有甚者，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过“九分发展、一分抗日”的“方针”，而且如临其境、栩栩如生，说毛泽东站在窑洞前，挥舞着双臂，亲口说下了这八个字。历史学家说，闻所未闻呀，于是找到始作俑者，一问，才知道“那是一种创作性的想象”啊，可见也是“民国”之事，但只是空穴来风而已。

关于“民国”，还有移花接木、

张冠李戴的呢！比如写一代巨逆陈公博之死，浓墨重彩他的潇洒，说他朗笑而赴刑场，缓步找了棵“铁骨铮铮”的菩提，从容整齐，盘腿而坐，高声而曰“此处甚好”，然后慷慨饮弹。如此地生死置外，这样地视死如归，几乎叫人怀疑那“卖身事敌”的帽子了。但真相如何呢？陈逆之死，哪有这般漂亮，这段临刑前的“悠然大度”，包括“此处甚好”的笑归之声，完全是瞿秋白烈士在刑场上的表现，结果拿来硬安在汉奸头上，叫做指鹿为马。

“民国”也不是漆黑一团，每个时代应该都有它的亮点，但从总体上而言，“民国”真是那么“令人神往”吗？恐怕值得怀疑哦——这个怀疑，当然不只限于对待一个“民国”、一段铁路。



新民随笔

从巴比松派到熏拉丝

董纯蕾

赶在克拉克艺术馆的宝贝们“做客”上海博物馆的最后一个月，去上博“拜访”《从巴比松到印象派》的名画。络绎的观众中，不时有专业人士朗声介绍那些笔触啊、构图啊、光影啊、虚实啊的精湛绘画技艺。我只知道，巴比松是巴黎近郊一个有着土地、森林、野花、池塘、动物、庄稼和农夫的乡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我只觉得，在巴比松派画家的笔下，乡村生活成了优雅与自然的代名词。

白肥美的鹅鹅鹅，一会儿出现在康斯坦·特罗扬的《放鹅人》里，一会儿又化身克劳德·莫奈《溪中鹅》的前景，令人仿佛置身充满鹅声蛙鸣的乡间小路。现在的鹅与蛙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别说当上大画家的缪斯女神，就连自由自在在地生活也常常成为一种奢望。在上期新民科学咖啡馆里，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长裴恩乐提到过，蛙类尤其是蟾蜍的数量在上海正连年锐减，早已进入上海市野生保护动物名录。以熏拉丝为代表的舌尖上的盛宴，常常让人们忘记了人与动物相处甚欢之美。

不久前，欧盟渔业委员会建议将深海拖网捕鱼和海底刺网作业从东北大西洋彻底淘汰，以终止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毁灭性打击，怎奈谈判结果大打折扣，这些残酷的捕鱼方式可能将被限制而非终结。世界各地的环保主义者近年来尽管人数见长，但多少有些似当年的巴比松派画家，依旧被很多人不接受、不理解。

全世界第一位计算机程序员、诗人拜伦的女儿勒芙蕾丝，年幼时应该和巴比松派画家一样热爱乡村。出于对飞翔的渴望，她从十几岁起就系统研究了小鸟和各种可充当翅膀的材料——羽毛、纸、丝绸……读多了这样的真人真事，我总相信，热爱自然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19世纪后半叶的人们，见惯了工业时代的先进与奢华，开始礼赞田园牧歌的优美与和谐；看久了学院派工笔之惟妙惟肖，开始欢喜巴比松派之风景写意。现在的人们，也纷纷把目光转向乡村，购置一栋乡间别墅，从此便可以过上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果真如此吗？来上几盘熏拉丝，不懂得欣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美，再美丽的乡间别墅也是枉然，不过是一栋没有灵魂的空壳，终究成不了一种优美的生活方式。

深化改革，领导干部是关键

权威声音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是指导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也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贯彻好、落实好《决定》，各级领导需要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改革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有全局的重点，条线有条线的重点，块块有块块的重点，制订各个领域、地区改革的路线图成了当务之急，

能否重点突破也是保证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

第二，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更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但解放生产力并非片面追求高速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

第三，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各级领导能否从大局出发，勇于推进涉及本部门、本地区不合时宜的既得利益改革，对改革全局至关重要。

第四，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系。对中国

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但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引发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也要高度重视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缩小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公平正义。

第五，处理好政府转职能与干部转作风的关系。各级党员干部必须把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取得的成果与政府转变职能密切结合，用政府转职能促进作风转变，用作风转变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李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文见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捐献难

「挽起袖口献爱心，骨髓捐赠好风景。谁知爱心定任务，名额已满不领情。」在西安工作的小魏准备捐献自己的骨髓，谁知血站和骨髓库均表示，今年采集骨髓的任务已经完成，要捐献只能等到明年三月。

孺子牛画

自由潭

前几天看了《新民晚报·夜光杯》上的一篇文章，说是在巴黎街头看到地上很多烟屁股，惊异法国抽烟人之多。这让我联想起十多年前在意大利的罗马街头，也看到人行道上、人行道边满地的烟头。当时我也很是惊奇：怎么有那么多人走在街上抽烟？忍不住去问导游，导游说：“现在提倡禁烟，任何屋子里都不能抽烟，有顶的地方也不能抽烟，那些烟鬼就只能跑到大街上来抽了。”

“那么，这么多烟头为什么不扔在附近的垃圾桶里呢？”我问。

导游说：“烟头是不允许扔在垃圾桶里的。如果烟头没完全熄灭，很容易引起火灾呀！”

我想，那倒也是。跑到街上来抽，二手烟容易被风吹散，总比躲在屋里让烟雾害人好。

去年，我又一次到罗马，发现街上干净多了，而人行道边每隔一段路就有一个半人高的垃圾桶似的小架子。顶上是个金属圆盖，下面离圆盖半尺距离有个金属圆盘，里面盛着水，那就是专为行人扔烟

头而设的。

不管怎么说，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烟头只在街上看得见，室内是没有人抽烟的！美国也是。纽约的冬天相当冷，但我不止一次看见那些办公大楼下，有人跑出来躲在墙角背风处，哆哆嗦嗦地在抽烟，肯定是熬不过烟瘾了。可天再冷，他们也不会在大楼里面抽。

回头看看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禁烟的口号也提了很久了，可是街上烟头不少，屋里更多！办公

室里，大楼里，有多少是完全禁烟的？最多在室内走廊什么地方挂个“吸烟处”的牌子，也不会有多少烟民自觉地去那地方抽烟。能设个“无烟区”的馆饭算好的，但是烟雾照样从屋里那些允许吸烟的地方飘过来。出租车里贴着禁烟的标牌，有的抽烟者就像没看见一样照抽不误，拼命为已够污浊的空气添雾加霾。

苦的是不抽烟的百姓，对二手烟无处可躲，熏出病来只能自认倒霉。

也来说说烟屁股

曹雷